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

趙益 著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

趙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 / 趙益著.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12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ISBN 978-7-5506-1717-9

I. ①六… II. ①趙… III. ①道教—古籍—研究—中國—六朝時代②道教—古籍—研究—中國—隋唐時代
IV. ①B95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319244號

- | | |
|-------|--|
| 書名 | 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 |
| 著者 | 趙 益 |
| 責任編輯 | 林日波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郵編:211523 |
| 開本 | 960×1304毫米 1/32 |
| 印張 | 7.375 |
| 字數 | 172千字 |
| 版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1717-9 |
| 定價 | 3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7572508) |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 工程”三期經費資助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總序

程章燦

古典文獻是傳統文化的載體，研究傳統文化，不能不從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做起。另一方面，對古典文獻進行整理、闡釋與研究，不僅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繼往開來、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一環。衆所周知，中國歷史悠久，古典文獻汗牛充棟，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而如何通過對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表達當代人的學術趣味和文化關懷，體現當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水準，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相當艱巨的。這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事業，可以分解成無數項具體的工作，需要很多同仁的投入與協作；同時也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事業，每一位傳統文化研究者都責無旁貸，儘管各人所能貢獻的也許只是涓滴之水。實際上，如果打一個比方，文獻傳承就好比一條河流，那個表面上似乎看不見摸不着的文化傳統，正如粼粼波光，蕩漾於寬闊的河面之上。這條河流蜿蜒曲折，在流淌過程中不斷接納來自山澗的溪流，吸收來自天上的雨水，也慷慨地奉獻，灌溉着其所流經的廣袤的中華大地。今天，這條河已經流到我們面前，我們怎麼能不對它有所貢獻呢？

有鑒於此，二〇〇八年，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同仁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文獻傳承與文化認同研究”叢書。在那一套叢書的總序中，我曾經強調文獻傳承對於傳統延續、文化建設

以及文化認同的形成的的重要性。我在序言的最後，表達了這樣一個態度：“也許我們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現在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一套“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就是我們繼續努力的表現。前一套叢書的標目，強調文獻傳承研究對於文化建設的現實意義，而這一套叢書的標目，則強調以新的視野來整理與研究古典文獻。從表面上看，兩套研究叢書似乎頗有不同，實質上却是相輔相成，後先承續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歷代成果積累之豐厚、傳統學術方法之完善，都使人們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感覺：這樣一門學科很難再有新的領域開拓和學術創新了。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感覺似乎有一定道理，因為我們畢竟處於一個與前人不同的時代，我們既沒有從小接受過古人那樣的蒙學教育，也沒有像前輩大家那樣深厚的小學基礎，甚至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皓首窮經，聚精會神，窮畢生之力專治一經。作為當代人，我們不得不分出若干精力，學習其他知識，掌握其他技能，以應付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之必需。但是，我們畢竟擁有某些古人所沒有的優勢，例如在文獻資源的占有和使用方面，我們便有着較古人方便優渥的條件。當代公私圖書館整理並開放自己的典藏，雖然並不完全理想，畢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新時期以來，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都是古人難以想象的。至於近年來，隨着方興未艾的電子技術和無所不在的網絡技術的發展，衆多體量龐大而且以前堪稱稀見的古典文獻，紛紛化身為便攜易檢的電子數據，成為幾乎隨時隨地都唾手可得的資源，這種景象非但古人無法想象，即使前推半個世紀，恐怕也沒有學者能夠想到。總之，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無論是影印出版還是整理出版，紛至沓來的文獻資源，為今天的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更開闊的窗口。文獻資源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也使當

今研究者擁有了文獻資源的新視野。

這裏所講的文獻資源，實際上已包含前人在古典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這些學術積累不僅是我們整理研究和消化吸收的物件，而且也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的基礎，使我們可能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套用那句老話來說，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就有可能比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不僅可以上下流連，還可以“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吸收國內外相鄰學科在文獻整理研究上的經驗和方法，提升研究的學術境界。掌握更全面完備的資源，輔以新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立足點更為高遠。在這樣的學術基點之上，即使處理古典文獻中的基本典籍和基本問題，也有可能采取與傳統學術不盡相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取得全新的成果。換句話說，視角的更新與多樣化，也就可能帶來視野的更新與多樣化。以往未曾受到關注、未曾受到重視的古典文獻，就有可能因此進入我們的視野，生僻可以變為熟悉，冷門可以變成熱門，伴隨着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風雲際遇，古典文獻學術史也將展現新的景觀。

運用包括現代電子技術在內的各種研究手段，不斷開拓可供利用的文獻資源，是當代古典文獻研究者的職責。在這一方面，除了重視對傳世文獻的發掘和整理，強調對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之外，還應該加大對既有文獻總體再加工的工作強度，生產出更多、更具學術價值的新學術文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志在建設一座古典文獻的宏偉大廈，那麼，除了發掘並整理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使用那些現成的建築材料，還應該自己動手，設計、發明和生產更方便、更安全、更堅固耐用的建築材料。要之，古典文獻不僅是供我們整理和研究的，也是需要我們生產、積累並重構的，只有這樣，這一資源才會日益豐富，而不至於陳舊、匱乏。

顯而易見，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是分不開的，輯佚學就是

很好的一個例子。輯佚學中既有整理，又有研究，是一門很能體現中國古典文獻學特色的學問：利用既有的古典文獻資源，努力恢復已經佚失的古代典籍，重建古典文獻彼此之間已經失落的某些聯繫，進行這些工作的學者，有如施展回春妙手的醫生，使亡書佚籍“無中生有”，甚或“起死回生”。在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整理，根據重新建構的新文獻，展開新一輪的研究，學術疆域便可能如漣漪般向外擴展。在這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獻是一個縱橫雙向開放、不斷變化、日益豐富的系統，而且應該看到，中國古典文獻還是一個環環相生、彼此聯繫的系統。乾嘉學人熱衷於輯佚之學者不乏其人，其旨趣絕不止於個別典籍，而是更着眼於其背後的那個宏大的古典文獻系統，志存高遠。在現當代學術界頗為流行的各種輯編彙纂，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說是從輯佚學中發展起來的，雖然二者的方法與結果有所不同，但是在“無中生有”的思路，却堪稱殊途同歸。當然，這些輯佚或者輯編彙纂涉及學科，規模不同，大小各異，類型繁多，形式多樣，其方法亦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作相應調適。至於其對象的選擇，則往往取決於學者的立場與旨趣。在這裏，新視野主要體現在整理和研究的方式上，這種方式不僅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旨趣，也在方法和視角上體現了現代學術方法的進步。

上文主要是就資源、視角、方法和動機這幾個方面而言，嚴格說來，古典文獻研究的新視野，絕不只限於這些。這一套叢書中所包含的諸書，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將會證明這一點。就像它的研究對象一樣，我們希望，這一套叢書也能成爲一個開放的系統，只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研究成果參預進來，古典文獻及其研究才能與古爲新，生機勃勃。

是爲序。

文獻引用標注凡例

- 本書所用明《正統道藏》爲文物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影印本；凡所引用藏中文獻，均注明《道藏》編號（據施舟人原編，陳耀庭改編《道藏索引——五種版本道藏通檢》，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以字母 DZ 表示；同時注明文物出版社等三家出版社《正統道藏》影印本冊號和頁碼，如（20/201）。

- 本書引用道經，儘量予以校勘，並多汲取現當代校勘成果。凡引用點校本，均按所用版本注明詳細出處，不再標示《道藏》編號和《正統道藏》影印本冊號及頁碼。其中，誤字以〈 〉標示，正字以〔 〕標示。

- 本書引用其它特殊文獻如敦煌文獻等，依學界慣例標示。

- 本書所有參考引用文獻，均在頁下注中注明，不再另列目錄。

目 録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總序 程章燦 (1)

文獻引用標注凡例 (1)

導論 魏晉南北朝隋唐道教文獻——意義與問題 (1)

第一章 《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研究 (13)

 第一節 《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九章》文本還原 (15)

 第二節 《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原型追索 (41)

 第三節 《上清大洞真經》的文體意義 (47)

第二章 《漢武帝內傳》研究 (56)

 第一節 《漢武帝內傳》的文獻問題 (56)

 第二節 《漢武帝內傳》的宗教性 (73)

 第三節 《漢武帝內傳》的文學性：儀式的戲劇化再現
 (84)

第三章 《真誥》研究 (94)

 第一節 句曲洞天：公元四世紀上清道教的度災之府
 (94)

 第二節 地下主者・冢訟・酆都六天宮及鬼官 (111)

 第三節 《真誥》與“啓示錄”及“啓示文學” (130)

 第四節 《真誥》與文學：以唐詩爲中心的探討 (147)

第四章 《三天內解經》研究 (162)

第一節 《三天內解經》“六天”意義之確指 (162)

第二節 《三天內解經》“三道”說的基本立場 (168)

第三節 《三天內解經》與《玄妙內經》的關係 (171)

第四節 《三天內解經》“三道”說的獨特性 (174)

第五章 《三洞奉道科誡經》研究 (178)

第一節 《三洞奉道科誡經》文本發展過程的補充論證
..... (179)

第二節 南北朝至唐道教科範的內容組成及其發展變化
..... (189)

第三節 《三洞奉道科誡營始》與唐初之際道教的整合
..... (208)

第四節 結論及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222)

後 記 (225)

導論 魏晉南北朝隋唐道教文獻 ——意義與問題

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初，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道教“形成”的階段。這種“形成”的最重要表徵之一就是經文的大量創製和“經藏”的形成。即就現存者而言，魏晉南北朝至唐初時期創撰的道經仍有數百種之多，並在很多方面保留了當時經藏整合的歷史痕迹，不僅成為道教史研究的材料淵藪，就是在中古社會文化史的意義上，也是一種重要的文獻寶庫。

在人文學術研究的意義上，文獻作為一切知識、思想創造和歷史軌迹的書寫記錄，客觀上就是人文學術（無論是歷史求索還是意義闡釋）的觀照對象，是人文學術任何學科或問題領域成立與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凡一門學科能夠擴充它的材料的便進步，否則便退步”已經成為現代學術的客觀狀態。同時，文獻的客觀性使其成為人文學術研究中的某種“公理”和“客觀證據”，可以為任何歷史考察、主觀闡釋和個相揭示實現證偽，從而實現科學研究所要求的糾錯功能。文獻的這兩個意義特性，反過來要求文獻本身首先必須進行研究，以建立它作為學術研究基礎的合理性。

作為中國學諸領域中國際化程度最高者之一的道教研究，其發軔正緣於《正統道藏》的重新利用和敦煌道經的發現，所以道教文獻本身的研究成為道教現代化研究的首要工作。迄今為止，道教文獻的研究也已走過了百年歷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始終成為推進道教研究不斷發展的基本動力。對此，現當代東西方學者已經進行了多方位的綜論，此處難以一一縷述。需要強調的是，

對道教文獻研究進行反思，重點應不在於是非評判和得失估量，而在於總結經驗、構建方法並提出新的問題。祇有堅持這樣的取向，纔能使道教文獻乃至道教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道教文獻特別是早期道經的研究較多着力於文獻屬性的考察。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緣於宗教的特性，宗教文獻往往被賦予天啓、神諭和先知之教的神學色彩，在作者、時代、版本、流傳等重要文獻屬性上被創教者有意識地去除或遮蔽了相關客觀事實。道教是偏重於“自然啓示”而不是“歷史啓示”的宗教，其教內文獻尤其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一方面，對道經的文獻客觀屬性的重視和追索成爲當代研究的一種基本態度和必然行爲；另一方面，也有相當的學者對是否能爲早期道經進行繫時並基本甄別所有《道藏》經書的文獻屬性抱有懷疑。

但隨着考察的深入，大多數道教學者們發現道經文獻屬性的認知甚至包括繫時完全是可能的。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較早就明確地斷言，《道藏》中絕大部分道經都可以被精確地定年^①。近三十年來的道經文獻研究和最近完成的集成式成果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道藏通考》)，都充分證明了這種論斷的正確性。原因在於：文獻記錄的內容是主觀的，但文獻本身却具有物質客觀性，文字、語言、體式、異文狀況、傳抄及流傳規律等等都屬於這種物質客觀性的因素，它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皆具有可知性。同時，中國古代史學發達，記史傳統特別是目錄文獻記錄從未斷絕，由此產生的傳統目錄學、校勘學技術手段較爲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糾正宗教內史的虛妄之處，爲上述

^① 司馬虛《最長的道經》，原發表於 History of Religion, 1978 年第 17 卷。此據劉屹譯本，載《法國漢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02 年。

文獻客觀因素的考察提供豐富的證據材料。另外，當代學術研究逐漸突破了早先時代較為單一的思考路徑，而代之以多學科、多角度綜合的觀照方法，也是文獻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重要因素。

這當然並不意味着文獻屬性的研究已經臻至頂點而不再成為問題，而是說明在基本文獻屬性之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早期道教經典的原型狀況和生成變化過程——逐漸凸顯出來。這個問題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從文獻學原理上說，所有古典文獻的一般文獻屬性都是隨着文獻的變化而變化的，如作者、時代即有原創作者、偽託作者、記錄作者、彙編整理作者和內容時代、書寫時代、成書時代、編抄時代等等不同。道經更不例外，幾乎每一種早期道經都經歷了層累和形態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過程決定了其文獻屬性的具體內涵。就道教研究而言，如果不能瞭解道經的發生與變化，不僅所有關於道經一般文獻屬性的研究都失去了意義，而且關於道教歷史和義理的研究也就成為無源之水。毫無疑問，道經原型狀況和變化過程的研究即道經的“還原”，是隨着道教研究的深入而必然引發的新問題。事實上，還原研究在道教文獻研究之始就已經出現，比如王明對《太平經》的研究、吉岡義豐對《三洞奉道科誠經》的研究、司馬虛對《度人經》的研究、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對《上清大洞真經》的研究、裴凝(Benjamin Penny)等對《神仙傳》的研究等等^①，祇不過近年來的研究目

① 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吉岡義豐《三洞奉道科誠儀范の成立について——道教學成立の一資料》，載吉岡義豐、蘇遠鳴(Michel Soyamié)編《道教研究》第一冊，東京：昭森社，1965年；司馬虛《最長的道經》，劉屹譯，載《法國漢學》第七輯，中華書局，2002年；Isabelle Robinet, *Le Ta-tung-chen-ching: son authenticité et sa place dans les texts du Shang-ch'ing ching*,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ume Two, MCB X XII, 1983; Benjamin Penny, *The Text and Authorship of Shenxian Zhua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34, 1986. 2. 案：以上並非全面總結，僅是舉其犖犖者而言。

的性更明確、涉及面更廣、程度更深、綜合性更强而已。

道經還原是一個極為艱難的課題。如果說早期道經一般文獻屬性往往祇是晦澀不明的話，那麼它們生成變化過程中的種種因素簡直就可以說是深藏不露，我們所能見到既祇是冰山一角，同時還有可能是一個虛假的幻像。這從反面映證出還原研究的本質：它既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文獻研究，更是一種綜合研究，需要擴大觀照視野，參資各種理論，採取多學科的方法。在此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敦煌道經的研究。敦煌道經的出世，不僅是某些道經佚籍的重見天日，更重要的是它彌補了早期道經流傳過程所缺失的“寫本”環節，為追索某種道經從今存《道藏》上溯的歷史淵源提供了關鍵性的材料，當然也為最終的還原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證據。所以，敦煌道經研究本身常常就以還原研究的面目呈現，同時絕大部分的早期道經還原也都與敦煌道經研究緊密結合，均取得了顯著的成果^①。敦煌學本身也是一種綜合研究，在多樣化視角、理論、方法的要求方面具有典型性。敦煌道經還原研究的突出成績，與此密不可分。

“還原”並不是恢復到原型，也不是對歷史過程的完整復原，因為原型或歷史過程常常是無法完全復原的。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還原”的真正意義在於對其可能性原型和變化過程中紛繁複雜因素的揭示，而不在於求得某種結果。所以，“還原”研究往往以多種面貌出現。種種不同的還原，都不過是從多種角度揭示出文獻變化過程的複雜性，從而提供不同的歷史意義。

二

宗教經典特別是創生型宗教的“啓示”(revelation)文本，一般

^① 關於二十世紀及近來敦煌道經的研究，可參閱劉屹的綜述(《經典與歷史——敦煌道經研究論集》第四章，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都是群體撰作和歷史層累的結果。同時，因為從口述到書寫的過程較為複雜，信仰表述又各有偏重，再加上不斷的義理化發展，所以經典的成書和流布不免體現出輾轉相襲又枝蔓紛歧的特徵，最後往往形成很多不同的、圍繞着某個中心文本的“文本群”。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經群”。像“大洞真經”和“靈寶五符經”等都是這樣的“經群”，甚至可以說絕大部分早期道經均是某種意義上的“經群”。

道教的“形成”是漢末魏晉以降各種原始宗教遺存和創生型宗教運動綜合作用的產物，因地域文化、歷史淵源和信仰特性形成了不同的派別，這些派別很早就形成了自身的經典。隨着宗教運動的深入，衆多不同的元素經過不同程度的義理化提昇產生新的教派，每一教派都重新編創了新的經典。這些經典就是以上所謂“經群”的彙聚。對此，我們可以名之曰“經系”。如上清經、靈寶經、三皇經、正一經在總體上都是對應於不同派系的“經系”。

當種種派別在宗教內因、社會文化等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由多元轉向整合時，不同的“經系”就形成了“經藏”。“經藏”不僅僅是整合以後的宗教的全部經典的物質合成，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體系化結果，是宗教整合內在理路的外在表現。道教經藏的成立以“三洞四輔”經典組織體系的完成為標志，時間應在公元六世紀初葉^①。

經系和經藏內在形成過程的複雜程度，遠過於經和經群。因為宗教義理不僅“神學化”了經典，同樣也“神學化”了經系和經

^① 陳國符最先認為，這個時期“目錄雖備，而叢藏未成”，“洎唐開元中編排纂輯，始以藏名”（《道藏源流考》序，中華書局，1963年）。這種觀點已被當代道教史研究所修正。目錄是經書彙聚的產物，同時其分類更是經群、經系組織體系的反映，因此無論是否存在着一個客觀的經藏，“三洞四輔”的出現都標志着經藏的成立。

藏。宗教內史和宗教理論將經系和經藏的形成過程賦予了宗教式的解釋，並以此取代了歷史實際。而不同經群的彙聚，已經不僅僅是單一經群的文本層累以及有意或無意的改換、割裂、拼裝和偽造，而是在創生型宗教內在理路作用下的引申、衍生、變形、重組。經藏的整合尤其特殊，它實際上和道教的整合是同一件事情，體現出更大的複雜性。如果說對經和經群的考察是所謂的“還原”，那麼對經系和經藏內在形成過程的研究就是一種“重構”，二者的不同在於：“還原”偏重於某一具體事物，而“重構”則着重於一個包含了種種事物的龐大系統；“還原”主要追索經典或經群的原始文本形態，而“重構”旨在摒除神學闡釋，發現經系組成、經藏整合的歷史動態實際。

對經系的重構，道教文獻研究者很早就開始了嘗試，但真正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大淵忍爾《論古靈寶經》一文為代表的對靈寶經的研究^①。他的開創性工作不僅標志着對靈寶經系統的重構的真正發軔，更重要的是在客觀上使“重構”成為一個嶄新的問題領域，引導了當代道教文獻研究在此方面的深入探討。近二十年來日本學者小林正美，本土學者王承文、劉屹等就靈寶經系展開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重構，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在上清系方面，賀碧來、司馬虛也有非常深入的考察，索安(Anna Seidel)認為他們的工作已經使四、五世紀的上清經典得到徹底的研究^②。現在看來，索安的結論仍主要是就一般文獻屬性而言的，並不意味着上清經系歷史動態實際得到了完全的認識。至少，上清經系和靈寶經系、正一經系一樣，均仍有待於更加細密的系統性重構。

① Ofuchi Ninji(大淵忍爾), On Ku Ling-pao-ching, Acta Asiatica 27:33—56, 1974.

② 索安《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呂鵬志譯，中華書局，2002年，第12頁。